

音乐伴随我的书法人生

·庞中华·

20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硬笔书法热潮，我经常背着手风琴到全国各地、到世界各地，去演讲“快乐书法”。此时此刻，我总是深情地想起重庆市少年宫，那是我少年时代的天堂，也是我音乐人生的起点。

我爱上了手风琴

12岁那年，我考上重庆求精中学。她是创立于1891年的四川名校。那古老的建筑，显示出她悠久的历史。据说，刘伯承元帅在这里教过书，张大千、袁隆平先生在这里上过学，抗战时期，宋庆龄、宋美龄在这里办过保育院。

我在“求精”读书，因为爱写字，经常为班上出墙报，这是我从事硬笔书法事业的萌芽时期。但最让我兴奋的，是偶然在校园里，看见我们音乐老师虹马，斜倚在那棵百年老黄桷树下，悠然地拉琴唱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噢！真美，就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手风琴。

世上真有“心想事成”的美事。就在见到虹马老师不久，我们班上文体委员黄昌汇同学带回个绝好消息：重庆市少年宫“声乐”“器乐”班正在招生，其中“手风琴班”要招20名学员。我立即找到了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邓代荣老师，由邓老师亲笔为我开了“介绍信”。事不宜迟，我一口气跑到市少年宫。

少年宫的“招生”工作正在进行。主持招生的陶老师看了我的“介绍信”，立刻让我唱一支歌。我唱了小学时学会的那首《歌唱二小放牛郎》，当唱到王二小光荣牺牲的时候，我的眼眶含满泪珠。陶老师点点头，用手掌在桌面上敲打着节拍，让我模仿这种节奏。然后微笑

着说：“回去吧，等通知。”

回学校后，我日思夜盼，两个月也没消息，我认为自己落选了，心中怅然。一天，在大队部门口，见到邓代荣老师，他问我：“你去少年宫了吗？你早就被录取了。”然而，这通知晚了，班里已经上了六堂课，我已经远远落伍了。我就先向其他同学学习，追赶进度。

我缺课太多了，心里忐忑。但少年宫十分周到，除每周规定一次上课，其余时间，学员可以自行安排来少年宫，请老师（管理的）打开琴房练习。于是，我每周借学校晚自习时间，向班长周素芳请假去少年宫练琴。少年宫的周老师和蔼可亲。每次她都是默默地、静静地陪我练琴，就像一个母亲看着孩子做功课那般专注。

我考上了“建专文工团”

1960年9月，我初中毕业，考上重庆建材专科学校（现西南科技大学）地质勘探专业。我们学校的“建专文工团”在重庆远近驰名。

我刚入学不久，文工团就贴出“招生启事”，我平时怯场，这回却大胆“应试”，总导演郑开礼老师亲自监考，听我演奏了朝鲜民歌《小白船》，中国民歌《花儿与少年》，他当即拍板：“要得，要得，到底是重庆少年宫出来的，很科班。”他马上宣布我被录取。

那一年，同我一起考上“建专文工团”的，还有来自重庆少年宫“笛子组”的曾祥炜。后来

曾祥炜历经艰苦奋斗，成为杰出的科学家。而今古稀之年，我们还高兴地商量，要回少年宫给孩子们讲故事。

当年在重庆，手风琴很流行。重庆歌舞团手风琴演奏家章马，是手风琴爱好者的偶像。我胆怯，没有勇气求教章马，但人间也有奇遇：我们庞家的大哥，也就是我伯父的大儿子庞申华，居然跟章马是朋友。当年，胡耀邦同志任川北行署主任兼川北军区政委，我大哥和章马是川北军区文工团团员。在大哥带引下，章马很高兴收我为“弟子”。

1965年，我从“建专”毕业，分配到北京。我二哥庞皖华特地买了一架“长江牌手风琴”送给我。此后，在20年的地质勘探队行旅中，我背着皖华哥赠送的手风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度过了多少个冷寂的夜晚。

琴声、书写、讲解融为一体

1980年，在文化前辈江丰、文怀沙先生关爱下，我的第一本小书《谈谈学写钢笔字》出版，《人民日报》在第一时间给以热情报导。1983年，中央电视台青年编导骆伟把我从太行山邀至北京，紧接着作了近五年《钢笔书法讲座》，中国大地开始了火热的硬笔书法热潮。

为了弥补学识的贫乏，我拼命地读书：不仅读书法，更读文、史、哲、科学、艺术、《教育心理学》等各方面的书，尤其是读到文化前辈沈尹默、丰子恺、钱锺书等先生论及书法和音乐的



2011年，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庞中华邀妻子王昌芝演唱一曲中国民歌《绣荷包》

“通感”，让我受益匪浅。我仔细琢磨研究这“通感”，第一，音乐和书法都是由各种长短、轻重、快慢的线条构成；第二，书法和音乐都富有鲜明的节奏感；第三，书法与音乐都具有感人的抒情特色。当我悟出了二者相通的因素后，就开始试用音乐元素一点点来解释书法。于是我用左手演奏音乐符号，腾出右手在黑板上书写汉字点画，嘴里同时讲解，当琴声、书写、讲解三者融为一体，和谐共鸣之时，带给听众的是多新奇的感觉享受，不由得掌声和欢笑声响成一片。

还有趣的是，由于音乐是“世界语言”，当我到世界各国传播中国书法，我就选该国的音乐和简单的语言来讲解，“到哪个坡就唱哪个歌”。

在“三高业余交响乐团”

自从创立用手风琴伴奏书写的“快乐书法教学”之后，我的书法教学走进了新的天地。我结交了很多音乐之友、书法之友。尤其难忘的是，我受邀参加了由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同志亲自倡导成立的“三高

业余交响乐团”在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演出，获得了新的人生体验。

所谓“三高”，是指从全国遴选出的100余名“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高级军官”，但前提必须是业余音乐爱好者，专业音乐家不在入选之列。

“三高乐团”团长是时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书记叶小文，他担任大提琴独奏员。2012年春天，我刚从纽约联合国书法班授课回京，就接到叶小文办公室电话，通知我前去报到。叶小文还告诉我，是岚清同志亲自点名要我参加。

乐团的安排简朴而富有成效，团员们素质也高。每到一处，都住在当地单位的招待所，在招待所食堂吃自助餐，俭朴、方便而实惠。乐团请来著名指挥家和音乐学院的教授做艺术指导，经过短暂的集训，就能把那么多中外名曲演奏得有模有样，气势不凡，令人耳目一新。

乐团手风琴五人小组在上海演出时，首席演奏员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同志，他技术娴熟，有扎实的基本功。排练时，他提出一个很中肯的问题：穿西装拉手风琴不合适！噢，我们都有同感。因为手风琴箱紧贴胸膛，演奏时风箱左右开合，不断与西装的纽扣摩擦，影响演奏效果。韩正同志立即请来缝纫师傅，为我们手风琴组一个个量体裁衣，每人订做一套燕尾服上台演出。大家别提多高兴了。

荣幸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将“三高乐团”所有团员集体吸收为会员，并且由中央电视台将音乐会作为当年一场特殊的春节晚会向全国播放，成为音乐界的佳话。

走出上戏那一年

·奚美娟·

刚刚写下这个题目，脑子里就跳出这么一句话：大时代里的小人物。这句话用在我这个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生的身上，真是再鲜活不过了。

被划拉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1976年的8月中旬，我和十几个同学一起，从上戏表演系被统一分配到上海市文化局。当时，市文化局所属的话剧文艺院团有三个：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海儿童艺术剧院。这三个院团的戏，我和同学们在读书时都观摩学习过，对各剧团的主要演员也都怀着崇拜之情，现在即将要与他/她们成为同事，心里的兴奋激动可想而知。但是，具体落实到哪个院团工作，我们心里还是无数，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到了正式报到那天，大约是上午九点，我们十几个同学集体来到市文化局。这是一幢坐落在巨鹿路上的花园洋房，建筑很高挑很洋气，但也显得有些陈旧。我们被工作人员带领到一间打蜡地板的



奚美娟（前排右）毕业那年在上海戏剧学院门口留念

空房间里，随便散坐着。过了一会儿，走进来了一位中年男子，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们前来报到的名单。他一一宣读名字，和我们每个人核对了一遍，然后有些无措的样子，说：“已经有许多年了，文化局没有进过艺术院校的大学生，其实呢，我们也不太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你们自己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想到哪个剧团去工作呢？”这一问，反倒把我们问住了，

大家面面相觑。

他看我们都不说话，就说：“那要不这样吧，”边说边伸出右手，往前方划拉了一下，好像把前面的空气一分为二，接着又说，“你们这边的几位就到儿童艺术剧院吧。”随后又指着另外几个同学说：“坐在那边的几位到青年话剧团去。”最后看了一下零散坐着的同学：“剩下的同学都到入艺。”我正好坐在最边上，于是，就被历史性地划拉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去工作了。一直到今天，整整46年。

终于成为一名正式演员

我在上戏读书的那几年里，时不时会被借到别的班级去参加教学演出活动。就在毕业分配到文化局所属院团的前夕，这样的事情又临到我的身上，我被借调到了表演系低年级的一个班级，参与排练一出大戏《纺织女工》，在B组担任主演。于是，到文化局报到后，其他同学都到自己所属的院团

去上班了，只有我又回到学校，每天在《纺织女工》剧组排练。

这样又过了半个月左右，应该是9月初的一天，学校广播通知，要大家下午三点去学校的剧场听重要新闻，我也随着全校师生进了剧场。一会儿，广播里传来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性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报道了领袖逝世的消息。广播声音还没结束，就听到剧场里此起彼伏的哭声。随后每个班级组织大家用白黄两色的纸做成小花发给大家佩戴。

又过了一阵，那个剧组宣布解散。我也就此离开学校，比一起分进上海人艺的同班同学晚了一个月，终于成为一名正式演员，归队入艺演员二团。

进入上海人艺后，最初发生的一件事，就是随着剧院全体演职人员，欢天喜地地到人民广场游行，庆祝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上海人艺的食堂外面有一面搭建雨篷的墙，平时

用来张贴各类会议和日程通知，在那段时间里，贴满了艺术家们写的各类诗词作品，以表达他们对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拥护，以及挣脱了压抑人性的枷锁后的由衷抒怀。

我记得其中有一首长诗朗朗上口，是胡思庆老师的作品。胡老师与我的班主任徐企平老师都是20世纪50年代文化部举办的苏联表演专家班培养的学生，徐老师曾请他来上戏为我们班代过半学期的课。我回到人艺后没几天，胡老师有一天见到我，欣喜地对我说：“你终于来了。”他成为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个领路人。

我在上戏求学时，平时接触的都是同辈同学，一到工作单位后，就走进了一个成人的世界，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是他们对年轻人的善意，使我们尽快领悟到一个真正成熟的艺术团体的丰富内涵。那时，剧院里许多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的恢复工作的权利。他们身上都迸发着一股内在的生命激情与能量，从我跨进人艺的第一天起，就强烈地感受到了。（摘自《大都市》2023年第1期）